

都市空間與現代激進人文地理的演進

——以亭子間文人為中心

朱 軍*

摘 要

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上海左翼文化運動是都市空間與激進人文地理學在中國歷史性互動的產物。亭子間是這一互動的核心場域之一，亭子間文人一度成為上海文人的代名詞。本文取歷史—空間—社會多元研究向度，以亭子間文人社群從邊緣到中心的崛起軌跡為中心，系統考察了都市空間與現代中國激進人文地理演進之間的深刻聯繫。本文對三條演進脈絡做了重點探討：（一）空間正義與左翼文化運動興起之間的交錯互生關係；（二）都市文學空間的激進化及其內生的分歧；（三）空間轉向與邊緣知識人的身分認同困境。

關鍵詞：都市空間、亭子間文人、人文地理、身分認同

* 作者現為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Urban Space and the Evolution of Radical Human Geography in Modern China: In Case with TingZiJian Writers

Zhu Jun

Abstrac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left-wing cultural movement is the product of historical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space and radical human geography in ShangHai. TingZiJian is one of the fields in the interaction, and TingZiJian Writers are synonyms for Shanghai's intellectuals groups at one t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Space-Society, with the case study of Tingzjian writers rising from the marginal roles to the centre,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ace and Chinese radical human geography within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1.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atial justice and left-wing cultural movement; 2. The radicalization of urban literature geography and internal differences of that; 3. Spatial turn and the identity crisis of margin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Urban space, TingZiJian writers, humanistic geography,
identity crisis

都市空間與現代激進人文地理的演進

——以亭子間文人為中心^{*}

朱 軍

一、前言

都市文化日益崛起，然而由於歷史和現實的種種原因，在學術史上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始終是一個無法現身的「他者」形象。即便是對於發源於上海的左翼文化運動的評判也往往陷入二元對立的誤區。這與鄉土文明在中國始終代表著「永恆的勝利」有關，但不能忽視的是，它也與都市研究中缺少以都市為本體的方法論有關。在當下的都市研究中，「空間轉向」¹無疑是最重要最核心的轉變。唯有在都市空間中，文化界的紳士、公寓裡的小市民、亭子間的浪子、棚戶區的階級弟才可以形成集合的力量，為時代的思想增加體魄，也為時代的生命增厚光輝。這是歷史大勢變遷使然，是社會重構的產物，也是空間力量的創造。空間政治及其文化實踐代表了都市革命最為核心的部

^{*} 本文係中國大陸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對話時代的中國文學研究》（項目編號：11JJD750021）之部分成果。

¹ 近年來，空間不僅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生產活動來理解，更是作為我們理解人類行為和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這激發了跨學科的、人文社會科學範式的「空間轉向」。參見 Barney Warf and Santa Arias, eds.,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10.

分。從空間研究的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發現，海派文化及其城市空間並不是一種與社會經濟變化無關的固定背景，而是現代生產體系中一種能動的、核心的和基礎的要素。對於一場文化運動的空間性的因素不可忽略。

激進主義在五四之後漸漸博興。²大部分作家都保有左傾的觀念，他們共同製造了「紅色三十年代」的中國回聲。現代文學史和社會運動史中，作為激進人文地理學與都市空間密切互動核心場域的亭子間不應被忽視。上海開埠後，亭子間寄寓了中國現代都市文人社群的底層，也哺育了左翼激進文化運動的中堅力量。「亭子間來的人」經過毛澤東（1893-1976）兩次講話的界定與重申，一度成為上海文人代名詞。亭子間因此提供了我們觀察現代中國激進人文地理學演進軌跡的重要入口。當下相關研究，對左派大眾鄉土文藝持肯定立場的研究者往往有意忽略亭子間文人的都市意識，而純文學研究者也往往以文學性之名對這一文人社群並不待見。這些偏執的「主義」，若只囿於邊見，即使不是虛妄，也是誤解。本文試圖基於歷史—空間—社會這一全新的多元研究向度，以亭子間文人社群從邊緣到中心的崛起軌跡為中心，展開對空間生產與文化生產之間交錯互生關係的批判性檢視，同時通過對空間轉向與現代中國文人社群的身分認同之間深刻聯繫的探討，初步勾勒出近代以來激進都市人文地理在中國的演進道路。

二、空間正義與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

真實的上海，並不單單意味著摩登，在光熱電之下暗藏著「被

² 本文對激進主義的界定參照余英時的相關論述。余英時認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並不是指一套思想，也不是指出某一特定的學派，而是一種態度，一種傾向，這種態度常常發生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有重大變化的時期。參見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再論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頁8-52。

詛咒的部分」。現代都市會把一種空間的隔離引向身分的歧視，也能把「他律」的壓抑轉換為「自律」的壓抑。亭子間便是這種空間與文化壓抑感的具象。亭子間中的各色文人，不僅包括左翼，它是五方雜處的中國現代文人社群的底層。亭子間也事實上成為上海文學的附屬物。在這一充滿非正義和不平等的現實空間中，人們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更合理的空間的想像和烏托邦式嚮往。以至於夏濟安在批評今日作家時指出，由於當下我們過多地享用空洞作品這種固定飲食，他也時常渴望那種可以在左派最佳作品中發現的強硬、嚴厲，和對社會正義的熱切關注。³ 在房荒的表象之下，在作為房荒重要表徵的亭子間文化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種歷史深處被壓抑的力量被激發出來。這背後是馬克思主義與激進地理學歷史性地交合互動。

（一）空間正義：亭子間文化的「力比多」

朗貝爾（Jean-Clarence Lambert，1930-）的《作品》（Opus，1972）中，在資本主義的法國無上的繁榮中，人們卻想要呼喊：「啊，革命或者死亡……」，但是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認為這並不意味著「去為革命獻身」，而是相反：「如果你們不想讓我們死，那麼請你們去革命，快速地、徹底地革命」。⁴ 這一總體性的、徹底的革命將會帶來權力的終結，而這指的就是這樣一種權力：它控制著人間的一切存在，卻並沒有控制任何一種來自他們卻又反過來危害他們自己的力量：技術、人口統計學、空間！⁵ 法共重要的理論家列斐伏爾揭示了空間權力與革命之間的微妙聯繫，這一聯繫並不是結構主義的一種僵化的功能鏈條，而是一種與微觀的權力和日

³ 普實克借用夏濟安的這段有關文學與社會正義的討論指出，這是對左翼文學更為公正的評論。〔捷克〕普實克：《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頁252。

⁴ 〔法〕亨利·勒菲弗著，李春譯：《空間與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導言，頁3。

⁵ 〔法〕亨利·勒菲弗著，李春譯：《空間與政治》，導言，頁3。

常生活緊密相連的血肉聯繫。

成仿吾（1897-1984）在1928年曾這樣描述他所置身的那個時代：「革命運動停頓了，革命文學運動的空氣卻高漲了起來。」⁶ 這個空氣的聚集地便是上海。革命的挫折和文學空間的壓抑導致了1927年前後國內外大批文化人在上海匯聚。其一是北京文人。由於北洋軍閥對文化人的迫害，導致大批文化人士流失，紛紛卜居上海。其中有魯迅（1881-1936）、梁實秋（1903-1987）、徐志摩（1897-1931）等人；其二是國共分裂後的革命知識人，他們從一線流散來到上海灘。其中包括茅盾（1896-1981）、瞿秋白（1899-1935）、周揚（1908-1989）、錢杏邨（1900-1977）等等；其三是歸國的留學日本、蘇聯、美國的知識菁英。例如胡適（1891-1962）、馮乃超（1901-1983）、李初梨（1900-1994）等等。其中大部分知識人因為經濟條件所限，或者由於隱蔽的需要都居住在極其簡陋的亭子間。蔣光慈（1901-1931）寫道：「我還記得我初次遇見你，在一間窄小不明的亭子間裏。」意味深長的是這首詩的標題是「在黑夜裏」。亭子間既是黑夜裏各色文人的避風港，也是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孕育場。

這個普遍恐怖盛行的時代，雖然總體性革命的成功離他們還很遙遠，但是肉體在空間中的壓抑卻已經被切切實實感受到。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作家籍貫的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了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⁷ 雖然魯迅此語是針對沈從文挑起的京海論爭的回應，泛指在上海工作生活寫作的海派文人。但是左翼文人顯然是其中最為赤貧、激進，也是最具凝聚力的一群。在二〇至四〇年代之間，上海「亭子間」成爲一個最爲典型的文學生產工廠之一。在這裡，物理空間的壓抑和心理空間的

⁶ 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如何纔能轉換方向的考察〉，《創造月刊》第1卷第10期（1928年3月），頁1。

⁷ 欒廷石（魯迅）：〈「京派」和「海派」〉，《申報·自由談》，1934年2月3日。

壓抑最終匯聚在一起，匯聚在文學空間之中。從文學革命走向革命的文學，從上海到延安，這群人最終完成了從邊緣到中心的遷徙。「『亭子間』作為一種文化隱喻，連同產生它的母體——近現代上海都市，在一種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語境中傾覆了」。⁸雖然他們驗證了人們對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傅里葉（Charles Fourier，1772-1837）和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住房烏托邦構想的批評之聲，但是他們用革命的、具體的空想反對反動的、抽象的空想，也為未來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至今仍然照亮現實，解決城市正義問題應該從城鄉關係入手，應該具有一種超越性的思維。既然都市文明必然會在人類歷史上取得一個顯赫的地位，那麼堅持對於底層空間正義的關懷與追求便不再是幻想，而是一個虔誠的願望。

在1920-1940年，因為戰亂和政治運動，上海的房荒問題達到了頂峰。上海房荒問題具有普遍性，而且最主要的困難是貧苦的勞工階層負擔不起哪怕最小面積的現代化住宅的租金。其時的工部局報告以英國為比較對象，對人口過度擁擠導致的房荒問題進行解釋，工部局工務處的前任長官 Mr. Charles Harpur（1813-1868）有一經典的描述：

關於人口過度集中的問題，簡直罄竹難書。首先，此種狀況與英國和美國沒有可比較之處，這個國家最窮苦的人們，經歷過最長時間的貧窮和苦難，比其他的國家更能接受難以忍耐的住居環境。而且，擁擠並不僅僅對於貧民階層，在任何形式的水陸交通工具上，到處都存在擁擠的現象，這種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只能由中國人自己逐步解決。至於上海，這個問題更加嚴重、持久，並蔓延開來，從虹口公園到南站，從大路到小道，無不如此。⁹

⁸ 葉中強：〈從城市邊緣走向文壇中心——亭子間作家及其文化釋義〉，《中山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頁20。

⁹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業社會處關於本市住屋問題的報告》（*Report of*

據張生《上海居、大不易——上海房荒及房客運動研究》記載，上海房荒分為「真房荒」和「軟房荒」兩種。¹⁰所謂軟房荒是因為戰亂帶來的經濟崩潰，讓南京路有大量待租的房子。一邊是空曠的豪宅大屋，一面卻是睡在馬路上的淒慘的流民。「其實上海何嘗房荒！平民雖立錐無地，而達官貴客，巨宅連雲。所『荒』的是平民沒有金條而已。」¹¹ 上海的空間分裂給美國軍官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以怎樣強烈的震撼：「這座城市沿江發展，也向鄉村蔓延，它把沿途的貧民窟吞噬了，而又把更多的貧民窟嘔吐在郊外：外灘十九世紀低矮的房屋被石砌的高樓所取代，……面向江面、走廊滿是酒吧的舊式英國俱樂部，已被一座新式俱樂部所代替，氣派之舒適豪華，即使倫敦西區的闊佬見了也會感到滿意。」¹²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認為居住的空間隔離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必然產物，而不是偶然現象。在上海，雖然這一「住宅缺乏」的意識形態帶有殖民的特色，但是即使在戰亂時期，居住隔離依然遵循著資本的生產和增殖邏輯，是資本謀劃的結果，是有意識的算計和規劃：

中國人有湧入上海租界的趨向。這裏房租之貴和捐稅之重超過中國的多數城市，但是由於人身和財產更為安全，生活較為舒適，有較多的娛樂設施，又處於交通運輸的中心位置，許多退休和待職的官員現在在這裏住家，還有許多富商也在這裏。其結果是中國人佔有了收入最好的房產，其中最好的，上面建築爲了中國紈袴子弟提供消遣的各種娛樂設施。這類紈袴子弟在太平天國前把蘇州和杭州看作地上的天堂，而現在他們發現這

the Housing Committee)，上海檔案館檔案號 U1-10-153。

¹⁰ 張生：《上海居、大不易——上海房荒及房客運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頁171。

¹¹ 柯靈：《楓橋的夢》（上海：文匯出版社，2001年），頁231。

¹² [美]史迪威著，黃加林等譯：《史迪威日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頁165-168。

些天堂的樂趣在福州路一應俱全。¹³

其中，「亭子間」至今仍是上海石庫門房子格局中居住條件最差、最不起眼的居住空間。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上海有大量的亭子間可供租住，租賃費用相對低廉。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測查資料顯示，亭子間的平均房租為3.91元。郭沫若（1892-1978）寫於1925年的一篇題為《亭子間中的文士》的短篇小說如此調侃一個亭子間作家的生活和精神狀態：「一座小小的亭子間，若用數量表示時，不過有兩立方米的光景……他在譯讀愛爾蘭文人 Synge 的戲曲集，他的腦子裏充滿著了叫化子的精神。」¹⁴。不過不能忽視的是，亭子間作為一個核心的空間地理因素，對於左翼的成長和風行扮演了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周立波便是一個代表人物，他說「亭子間開間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職員和窮文人慣於居住的地方。我在上海十年間，除開兩年多是在上海和蘇州的監獄裏以外，其餘年月全部是在這種亭子間裏渡過的。」¹⁵ 拖家帶口的亭子間作家的房間裡，「爐子、床、孩車等等薈萃一堂，看起來緊湊固然緊湊，但其紛亂真使人不安，彷彿是亡命徒暫時作客，像大難臨頭，也像兵災剛過。」¹⁶ 在這裡，一方面身分與空間被固化，體現著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地位關係；另一方面，現代城市空間矛盾與衝突聚合在方寸之間，更聚變於喚醒靈魂的文學作品中。在都市空間中，城鄉矛盾的激化首先展現為空間排斥和隔離效應，隨後便是追求空間正義的激進運動甚至革命。藉助「空間—權力」的視角，我們或許可以理解，雖然後人對亭子間文人蔣光慈的創作多有非議，

¹³ 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頁21。

¹⁴ 郭沫若：〈亭子間中的文士〉，《現代評論》第1卷第8期（1925年1月），頁9。

¹⁵ 周立波：《亭子間裏》（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頁113。

¹⁶ 施肇：〈上海和北平〉，收於楊斌華編選：《上海味道》（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72。

但其巨大的煽動力量正是這個時代一種激進的空間正義觀的折射。1932年8月1日《現代》雜誌第1卷第4期所發表的〈田野的風〉書評，一方面稱「蔣光慈先生的作品向來就是很單純的：文筆是單純的文筆，人物是單純的人物。他只能寫固定的典型。」但同時又指出，蔣光慈的作品「卻能夠有更多支配讀者的力量。蓋棺論定，他始終不失為一個有力的煽動的作者……能夠這樣有力地推動青年讀者的作家，卻似乎除了蔣光慈先生之外沒有第二個。」正是在不同人群的博弈中，城市空間既相對穩定，又不斷發生著歷史性的變遷。

需要辨清的是，亭子間處於城市中心區域的石庫門之中，不同於勞苦工人的棚戶區，後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貧民窟，前者居住條件雖與貧民窟無異，但從人文地理學的視角看，它更像一塊奇特的文化飛地。有學者對「城堡」和「貧民窟」和「飛地」做了區分。馬庫斯（Peter Marcuse，1928-）認為，「貧民區」與支配群體對從屬群體的排擠和限制有關，而「城堡」則代表享有階級特權和種族特權的人限制他人權利的、具排擠性的社區。「飛地」是指有親密關係之群體的聚集地，人們享有平等機會和移居的自由等基本價值。¹⁷ 有一個基本共識是，居住分化的問題不在於各種各樣的差異群體身分本身（有人認為群體差異本身就是成問題的，由此產生了不尊重、衝突和缺少交流的困境），而在於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排擠過程所產生的結構性不平等。因此城市研究芝加哥學派認為，城市空間需要為這樣一個灰色世界留有一小片神奇的、聖潔的，具有鮮明個人或小集團性質的，具有主觀色彩的領地。離鄉知識青年在亭子間中快速積聚得益於亭子間與城市飛地具有疊合的地理學構造。他們是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1867）筆下的「浪蕩子」，是花花世界裡的波西米亞人，也可以是充滿革命烏托邦激情的左翼知識分子。

¹⁷ Peter Marcuse, "The Enclave, the Citadel, and the Ghetto: What has Changed in the Post-Fordist U. S. City," *Urban Affairs Review*, 33 (1997): 228-264.

要言之，城市飛地的包容性、異質性為一種微型的革命烏托邦提供了孕育的蛋殼。壓抑的能量與亞文化的抵抗能量成正比，亭子間惡劣的空間環境把文學的「叫化子」聚合在空間正義的大旗之下。空間正義成為文學生產的「力比多」——一種內生的促發力量。這既是文學生產的過程，也是抵抗的空間被生產的過程。

(二)「薄海民」與都市青年亞文化

都市空間的陌生性、無限性為多樣化的亞文化群體提供寄居的家園，最廣大的海洋裡孕育了最微小的生物，微小生命以數量優勢則可以戰勝強大的事物。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指出，「在一個新的普遍意義上，陌生性與你的個性是不可解地一起被給予的。」¹⁸這是一種表現活躍的烏托邦空間。都市文學選擇邊緣立場意味著對一種引人鼓舞的無政府、無中心行動的包容性行為。

瞿秋白較早論述了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以來上海的青年亞文化現象。他指出：「『五四』到『五卅』之間中國城市裏迅速地積聚著各種『薄海民』（B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知識青年。」¹⁹右翼的鄭學稼（1906-1987）根據李健吾（1906-1982）譯作中對近代巴黎「浪子」的描述，注意到以魯迅為旗幟的一般左翼文化人身上的類似巴黎「浪子」的氣質。²⁰「亭子間」已經儼然成為一種進步青年的生活方式。「亭子間」雖然體現了居住者近乎赤貧的經濟地位和無名小卒的文壇地位，但是這裡的浪子情懷也是讓人不能割捨的。「願意合租亭子間，吃包飯，既省錢方便又可免去孤獨的傷感，而且別有一番苦中作樂的浪漫情調」。這非常吻合周立波初來乍到的情形，幾

¹⁸ [德] 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59。

¹⁹ 何凝（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上海：青光書店，1933年），序言，頁17。

²⁰ 鄭學稼：〈論我國文學家及其作品〉，《中央週刊》1941年第4期，頁2。

個益陽老鄉「合夥弄了兩個火油爐子，自己燒菜做飯，過著一種清苦而又閒蕩的生活」。²¹這一情境並不外在於空間，它居於「氛圍建築」之中。文學創作也是一種「情境創造」和「空間建構」過程。左翼文學中彌漫的頹廢、抵抗、悲哀、屈從、團結的情調來源於歷史的觀念、作家的靈感，同樣來源於亭子間的空間創造。對於從鄉下、外地趕來的知識青年來說，「亭子間」不僅是物理性的存在，更是富有精神意蘊的空間。它已經不單單作為一種生存的背景而存在，更體現了一種文化的承諾。這代表了一種新的人際網路、一種新的身分認同，一個局部地再創造的歷險。

都市亞文化飛地首先具有包容和自由的特徵。謝冰瑩（1906-2000）在上海接到其三哥的信和匯款，促她北上投考北平女師大時，「不願意離開這個文人薈萃之地，她覺得上海是文人的搖籃，亭子間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別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²²作為城市的邊緣和灶披間的上層建築，二十世紀二〇至四〇年代的上海亭子間是一個成色龐雜的市民社會中的底層。失業職員、窮大學生、傭工小販、低檔妓女可以在這裡找到一小塊生息之地，這裡也是滋生新進作家、藝術家的域外田園。它在接納被城市邊緣化的社會成員的同時，也在敘述一個個關於從城市邊緣走向文壇中心的故事。在同一空間中，即使作為現代主義文學先鋒的新感覺派在大革命失敗之後也翻譯和出版過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和理論著作，而且還「轉向」寫過一些普羅小說。劉呐鷗（1905-1940）如此表達這種趨新思想與正義觀，「現代的日本文壇在一個從個人主義文藝趨向於集團主義文藝的轉換時期內」，認為日本新感覺派「描寫著現代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腐爛期的不健全的生活，而在作品中露著這些對於明日的社會，將來的新途徑的暗示」。他還認為《色情文化》當中其他幾位作家「也都用著社會

²¹ 胡光凡：《周立波評傳》（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25。

²² 閻純德：〈謝冰瑩及其創作〉，《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頁120。

意識來描寫現代生活」。²³

因此我們不能僅僅把這一自由理解為個體層面上的自由，它還指向公共空間生成期的「團體之自由」。亭子間作為一個被正在崛起的商業、出版中心和擁有治外法權的政治活動中心包圍的亞文化飛地，其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些蝸居亭子間的左翼文人窗外就是廣闊的市場和讀者。即使在戰爭中，閘北、南市被日寇炸毀了，「公共租界內的3所學校在戰爭期間仍然授課，按常規聽課的學生400人，而僅1938年7月一個月，聽課人次就超過8,000人，幾乎是戰前聽課人次的兩倍」。至於人力車夫的閱讀情況，也是有些記載的：

1933年成立上海人力車夫互助會，為互助會成員提供教育設施都是免費的。互助會設有7所以車夫的孩子為對象的學校。成人學校的對象則是車夫本人。互助會的每一辦公區都設有閱覽室，訂有較有影響的報紙與畫報。通常，閱覽室旁設有茶室作為休息室。互助會還設有流動圖書館，每期有圖書500冊以上。這些設施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1937-1938年間，閱覽室讀者為273,592人次，平均每天750人次，圖書館101,503人次，平均每天278人次。²⁴

在「洛陽紙貴」的背後是新文學運動在都市的成功，而文學運動的成功首先應當歸功於追求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努力。沒有大量新興左翼文學報刊、書籍的出版與發行，我們很難想像它會成為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眼中人類「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杆」。²⁵ 亭子間由於毗鄰出版中心自然成

²³ 劉訥鷗：〈色情文化·譯者題記〉，收於賈植芳等編：《劉訥鷗小說全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頁211。

²⁴ 盧漢超著，段煉等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79-80。

²⁵ [德]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為各種文學青年的聚集地。無論是自由主義文人還是左翼作家抑或是「性愛作家」，都對亭子間的文學夢念念不忘。例如1925年秋冬之際的葉靈鳳（1905-1975）住進了阜民路（今光啟南路）周全平（1902-1983）家的亭子間，兩個創造社的小夥計在那裡同編《洪水》半月刊。周全平這樣描述：「小小的一間方形亭子樓，……年少的兩個默默地對坐著，翻著原稿，塗著校樣，只很少的時候，才偶有工作疲倦後的一聲歎息，一次欠伸，一次對語。」²⁶ 葉靈鳳直到晚年仍惦念著那間亭子間：「因為正是從那裏開始，我正式離開家庭踏入了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我第一次參加了刊物的編輯工作，並且親自校對了自己所寫和自己付排的文章。……這意味著我已經正式踏上『文壇』了。」²⁷ 自由主義文人梁實秋在上海期間與魯迅大打筆戰。他當時在《時事新報》編輯副刊《青光》月入100元。如按當時上海一個中等階層家庭（五口之家）的月開銷為66元的標準來計算，這樣一筆較穩定的收入也算不菲。雖然他自認為這是他一生中最困窘的時光，但依然感到：「雖然僦居窮巷，住在裏面卻是很幸福的。……每天夜晚上班發稿。事畢立刻回家，從後門進來匆匆上樓……吾愛吾廬。」²⁸

在現代出版機器這一時光機裡，青年文化以理論或作品的形式被「生產」出來導入文學消費網路，播撒下自由的種子。這啟動了亞文化從邊緣上升到主流的歷史進程。這個歷史進程和歐洲的啟蒙運動一樣，首先是鎖住了言語的生命，然後才是促發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在這個意義上，左翼文學運動在它進入「文學史」的視野之前，更可

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卷，頁42、第47卷，頁427。

²⁶ 周全平：〈關於這一年的洪水〉，《洪水周年增刊》1926年12月1日，頁31。

²⁷ 葉靈鳳：〈記〈洪水〉和出版部的誕生〉，參見李廣宇：《葉靈鳳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19。

²⁸ 梁實秋：〈槐園夢憶——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收於江虹選編：《梁實秋散文》（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頁285-286。

以說是「出版史」中不可忽視的一頁。它不僅引發了新聞自由的實踐，「革命文學論戰」也激發了不同思潮和陣營的正面交鋒。70餘種報刊和60餘家新書店組成的生產線製造了革命文學第一聲啼哭。創造社、太陽社等亭子間文人社團以《文化批判》、《海風週報》、《新流》、《太陽》、《創造》為陣地，以光華書局、春野書店、現代書局為戰場，掀起了令人矚目的紅色旋風。蔣光慈等人的「革命小說」雖然被後人譏評為「偽文學」，但是這一「時代之聲」卻被盜印成風，為左翼文學迅速贏得了大量讀者。在此群眾基礎上，隨著周揚等人從亭子間到陝北窯洞的轉場，左翼文化從亞文化逐步抬升為新時代的主流變得「觸手可及」。

概言之，左翼青年文化運動與歐洲啟蒙運動的相似點在於，它是對一種以「合理性」名義將人性定義為共同本質的思想的批判。這一亞文化帶來一種新鮮的個性感，同時也帶來了一種文化上的、詮釋學意義上的「相互理解」。²⁹ 因此，普實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孟繁華等諸多學者呼籲在「革命史」與「文學」的研究視野之外，對左翼文學運動的研究採取一種「新文化史」的觀照方式。通過如上對這一青年亞文化空間生產機理的剖析，或許有助於我們打破「文學—空間—社會」之間的話語柵欄，呈現出「奔流」之下思想大陸的全貌。

（三）一種深刻的空間權力轉移

出版和文化流通的背後，折射出一種更為深刻的空間權力的轉移。與歐洲一樣，一種前市場社會的權力正在從宮廷轉移到城市，從鄉村轉移到新的熱土。在市場社會有錢就有權。上海與倫敦一樣就是那金錢的源頭，是商業社會的紀念碑。亭子間正是立於這一源頭之上。正如西美爾（Georg Simme，1770-1931）所說，貨幣經濟使得一

²⁹ [德] 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頁259-260。

種完全普遍的利益和一種在任何地方都一樣有效的聯繫與交流的手段成爲可能。³⁰ 商人不大關心文學商品的「左翼」「右翼」之類的標籤，他們的目的不過是以本求利。魯迅 1932 年講過一個小故事，很能說明商人參與左翼文學事業的動機：「當年上海的四馬路，號稱文化街，各種大大小小的書店集中在這裏。反動派看到許多店裏擺的是左翼的書和雜誌，讀者買的是左翼的書和雜誌。他們自己的反動書店門可羅雀，反動書刊無人過問。無可奈何之中。把賣左翼書刊最興旺的一個書店老闆捉了來，審訊他爲什麼不賣右翼的書？爲什麼愛賣左翼的書？這個書店老闆回答說：『我是老闆，將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盤』」。³¹ 與十三世紀歐洲農奴可以用貨幣代替勞役的內在動機一樣，商業文明所遵循的貨幣哲學也是一種邁向自由的偉大進步。因此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市亭子間裡的赤貧卻意味著空間上的富足。這個空間「它允許最明確的保留權、個性化和個性自由的存在」。³²

另外，租界與亭子間的毗鄰互動也爲追尋空間正義的文學活動注入了活力。租界和亭子間在某種意義上都代表一種「定位政治學」無法看清的領域。這裏是一種徹底開放的空間的邊緣，一個意義深遠的邊鋒。它傾向訴諸於一種挑戰性的政治姿態完成自身的表達。1930 年 2 月 16 日，夏衍（1900-1995）、魯迅、馮雪峰（1903-1976）、鄭伯奇（1895-1979）、蔣光慈、馮乃超、錢杏邨、柔石（1902-1931）、洪靈菲（1903-1933）、陽翰笙（1902-1993）、潘漢年（1906-1977）等在公共租界的咖啡館秘密集會，商討成立左聯事宜。1930 年 3 月 2 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大會在公共租界越界築路區域寶樂安路 233 號（今多

³⁰ [德] 齊奧爾格·西美爾著，費勇等譯：〈當代文化中的貨幣〉，《時尚的哲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 年），頁 99。

³¹ 于伶：〈魯迅「北平五講」及其他〉，收於孫慎之、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在上海（一）》（聊城：山東師院聊城分院，1979 年），頁 188。

³² [德] 齊奧爾格·西美爾著，費勇等譯：〈當代文化中的貨幣〉，《時尚的哲學》，頁 99。

倫路201弄2號)的「中華藝術大學」召開。為安全計,左聯其他的集會和聯絡地點也往往選擇租界。左聯人士正是利用租界的特殊環境與當局的迫害展開周旋。租界還為左翼作家的創作提供了較寬鬆自由的語境,因為租界當局執行的是言論自由政策,對於作家說什麼,寫什麼,是不大干涉的。當然租界與亭子間也不完全是一個安全地帶,但是正因為它始終處於危險的邊緣,這個反抗的社會就更要一個烏托邦理想照耀他們前行。這個時代,社團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社會依託」。³³沈從文感歎,「盡蹲在上海,又不能同什麼團體發生特別關係,又不能做別的事,各方面感情越來越壞,門路越來越窄,到某一天害一場病,就真非倒下不可。」³⁴亭子間作為亞文化飛地的重要特點就是,這種居住區的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他們願意臨近親密關係群體而聚居的偏好。這種租界社團和亭子間文人群體的「鄰里關係」是帶有革命文化親緣性的亞文化團體的標記。

因此作為亞文化飛地的亭子間也可能包容「欲望的真正的英雄」。這是一種激進的人文地理學的重要空間表徵。從其後的左翼文人與魯迅之爭之中可以看出,成仿吾們對馬克思鬥爭哲學「機械地運用」,不僅僅來源於他們對中國現實國情過於簡單化的判斷,還與他們身上的某種「『薄海民』(Bohemian)——小資產階級的流浪人的智識青年」的劣根性有關,魯迅先生稱之為他們中了「才子加流氓的毒」。³⁵究其根源,這一飛地並不比鄰鄉土,但也不完全屬於都市。當城市的資本力量賦予他們普遍性、平凡性的同時,也需要一種戲劇化和浪子情緒才能填滿他們的胃口。洪靈菲《愛情》中的一句話可以作為注腳:「在最初,我們都為著滿足我們的好奇的欲望而革命。」

³³ [日]小派正子著,葛濤譯:《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34。

³⁴ 沈從文:〈朋友已死去〉,收於劉洪濤編:《沈從文批評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頁361。

³⁵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卷,頁297。

早期的「享樂主義青年」的形象，例如蔣光慈《沖出雲圍的月亮》的王曼英、《追求》中的章秋柳醉心於到跳舞場，到影戲院，到旅館，到酒樓，甚至於想到地獄裏，到血泊中感覺一點生存的意義，追尋時時刻刻熱烈的痛快。並且章秋柳的「要求新奇刺激的癮是一天一天地大起來了」，這一點和海派的性愛作家以及劉呐鷗、穆時英的新感覺異曲同工。性的刺激和身體的迷向是新生的都市誘惑的最好表達。左翼青年作家不一定是擅長左翼文學創作才選擇了左翼文學的門路。陽翰笙（1902-1993）多年以後坦言：「我們這些人都年輕。我們有熱情，但缺少經驗；我們敢於革命，但不熟悉社會，不深知歷史，不善於革命。」³⁶而這一激進的人文地理風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年輕人容易成爲社會主義追求者或信仰者」，「青年接近政治時，多取得是『戀愛』態度」。³⁷

質言之，空間正義成爲文學實踐無意識層面的一種重要推動力量。這是一種底層階級的狂歡節文化，代表了自下而上的欲望生產過程。在一種「心理集體」的狂喜之中，一方面預演了一種天下大同的烏托邦，一方面以一種激烈的姿態將階級等級、性壓抑、家長威權、經典教義悉數拋在腦後。這引發了空間權力從等級社會向商業社會、權貴階級向底層階級、父權體系向身體解放的轉移。

三、都市文學空間的激進化及其內生分歧

如上所述，亭子間文化展現了一種政治無意識在中國具象化的歷程。在批判人文地理學視野下，這個「他者」被視爲外在於「城市共同體」，但作爲城市的一種要素卻不可或缺。上世紀二〇至三〇年代上海文化的大繁榮很大程度得益於亞文化的大勃興。隨著一大批「薄海民」在上海聚集，一個激進的都市青年亞文化社群初具雛形。這些

³⁶ 張大明：《左翼文學論·序》（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5。

³⁷ 沈從文：〈性與政治〉，劉洪濤編：《沈從文批評文集》，頁156。

「浪子」基本生活在租界亭子間中，並且抱有左傾的觀念。魯迅與左翼作家的合作和論爭提供了我們理解這一亞文化飛地的重要入口。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所說，社會學研究中，知識分子的共性在於往往「不是把精力集中於環境的積極的潛在性上，而是成了潛在於環境中的誘惑性的俘虜」。³⁸ 在錯綜複雜的理想、主義、人事、口號之爭的背後，以「情感地理」³⁹ 為視角，基於空間矛盾和「情感—空間—身體—社會」差異結構的分析，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超越瑣碎，理解現象之下的人文地理脈絡。

（一）魯迅與亭子間文人「生命史」的差異

隨著革命文學風起雲湧，上海亭子間中的文人也展開了對魯迅、茅盾、郁達夫（1896-1945）、葉聖陶（1894-1988）等五四代表作家的猛烈批判。馮乃超在〈藝術與社會生活〉中攻擊魯迅「常從幽暗的酒家的樓頭，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反映的只是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⁴⁰ 成仿吾則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中把魯迅定位「以語絲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標語是趣味」，「所矜持的是『閒暇，閒

³⁸ [德] 卡爾·曼海姆著，黎鳴等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頁159。

³⁹ 傅柯、列斐伏爾、蘇賈為代表的空間政治經濟學派認為，「情感地理」是對情感表現與空間性的諸種關係的具體化。他們將空間闡釋為一種「具體的抽象」，一種類似於馬克思對商品形式進行概念化的社會象形符號。參見愛德華·W·蘇賈著，王文斌譯：《後現代地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前言和後記，頁11。Joy Davidson、Liz Bondi、Mick Smith認為情感地理研究主要關注三方面：1. 情感定位於身體與地方，即探索情感在何處產生的問題；2. 人與環境的情感關聯，即研究情感如何在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其中涉及到地理身分與社會關係要素；3. 情感地理的呈現，即通過建構情感表現的模型進一步從理論上探討情感地理的本質內涵。

⁴⁰ 馮乃超：〈藝術與社會生活〉，《文化批判》創刊號（1928年1月）。見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等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2冊，頁8。

暇，第三個閒暇』，「代表著有閑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裏面的小資產階級」。⁴¹ 在「石厚生」（成仿吾）的眼中，魯迅正在走向「更深更不可救藥的沒落」。因為睡在鼓裏，李初梨認為「魯迅對於社會意識完全盲目」。⁴² 郭沫若則以杜荃的名義把魯迅的人生概括為三部曲——「封建餘孽—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諦」，「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遊移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⁴³ 這些過激的言辭儘管反映了青年文人試圖藉抨擊老牌文人換取社會資本進而迅速上位的焦慮，但是僅止於此，我們便無法辨清為何這一緊張也普遍反映在同時代人以及上下代人身上，甚至延續到今天。

撥開歷史重重的迷霧，首先我們應當返回本源，從生命史（life-stories）的角度，觀察一下魯迅與亭子間文人間分歧和成見的由來。在不同的環境、居所有著不同的歷史想像，使得後來的研究者可以看見各種情感地理的社會結構。魯迅一生對租界情有獨鍾。魯迅到上海的第一個驛站——「共和旅館」便是在租界。直到其 56 歲的時候，也就是他臨去世以前，他還想搬家到一處更好、更安靜的房子去，他心目中的理想住所，仍在租界。魯迅在上海十年的三個寓所，即景雲里 23 號、拉摩斯公寓和大陸新村 9 號，都位於真正租界化的區域。景雲里毗鄰公共租界的虹口，拉摩斯公寓位於北四川路 194 號，大陸新村 9 號位於施高塔路。北四川路和施高塔路都屬於公共租界越界築路的區域，即所謂的「半租界」。越界築路的區域同樣

⁴¹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見《文學運動史料選》，第 2 冊，頁 8。

⁴² 李初梨：〈請看我們中國的 Don Quixoto 的亂舞〉，《文化批判》1928 年第 4 號，頁 20。

⁴³ 杜荃：〈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收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革命文學論爭資料選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上冊，頁 578-579。

是處於整套租界制度之下的。半租界的形成是由於租界擴界的受阻。直到1924年，「租界擴充問題既不能如意解決，如郭泰納夫（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1882-？）所云，外人社會是一定要另覓新的解決途徑的。這途徑便是越界築路。因為越界築路不僅是『租界擴充之間接手段』，亦且是『租界界線向前伸展幾乎覺察不著』的方法。」⁴⁴魯迅四次避難的容身地——內山書店、花園莊旅館、大江南飯店、千愛里3號（內山完造夫婦的寓所）都在租界區。

魯迅認為，「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上。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貴起來的了。」⁴⁵他在致曹白的信中說了搬家的條件：「一要租界，二要價廉，三要清靜。」《魯迅日記》中記載：「同廣平攜海嬰往法租界看屋。」次日他在致宋琳的信中說：「頗擬搬往法租界，擇僻靜處養病，而屋尚未覓定。」甚至在他的雜文中可以看到痕跡，1934年末，魯迅曾在《病後雜談》中寫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淵明的好句，但我們在上海學起來可就難了……然而要租一所院子裏有點竹籬，可以種菊的房子，租錢就每月總得一百兩，水電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兩，單是這兩項，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塊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塊六。」其實魯迅對上海的談論一般都特指上海租界，如〈上海文藝之一瞥〉、〈「京派」和「海派」〉等，開始談的時候就點名「租界」或「洋場」。透過《尋訪魯迅在上海的足跡》，⁴⁶可見在魯迅的心理視閥中，情感和思維的邏輯大都指向租界，這也是心理學上情感記憶和興奮點的選擇性所指明的。文化批評主義的代表人物C·賴特·米爾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就生命史與思維特性的關係有一個精妙的比喻，他說，「每一個制鞋匠都認為皮革是惟一的東西」。儘管這一比

⁴⁴ 徐公肅、丘瑾璋、蒯世助等：《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97。

⁴⁵ 何家幹（魯迅）：〈中國人的生命圈〉，《申報》，1933年4月14日。

⁴⁶ 周國偉、彭曉所：《尋訪魯迅在上海的足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

附失之於僵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思維定性始終滲透於文學、歷史與行動之中。否則我們難以辨清為何魯迅與左翼文化的論戰主題會反覆重演，一直延續到胡風集團的覆滅。畢竟歷史並不是任性的。

作為早期的帶有全球化色彩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文化飛地，上海的租界文化帶有鮮明的雜糅色彩。我們不必諱言這裏是西方人的一種文化構造物，西方世界用一種異托邦的虛構文化來陪襯和確證自身的優越，並且維護自己的利益為侵略擴張服務。但在部分知識人的心中，這恰恰是「必要的邪惡」。1850年代以後，上海租界便成為商人、政客、激進知識分子和普通市民聚居的城中城。伴隨著一種文化的「混雜性」，左翼文化實踐了知識的挑戰者的角色。在租界，無論「雲裡霧裡的第三種作家」、「跳舞場裡的前進作家」，還是「亭子間裡的無名作家」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⁴⁷ 這個控制鬆散的空間，卻充滿了活力和能量。徐志摩在《新月》的發刊詞中，將當時的上海「思想市場」分為感傷派、頹廢派、唯美派、攻擊派、偏激派、淫穢派、熱狂派、標語派、主義派等等十三個派別。至於魯迅的雜文更是拉拉雜雜，報刊新聞電報信手拈來、隨意拼貼，更加從形式上襯托了租界文化的混雜色彩。因此，當1927年南京政府設立上海特別市為收回租界作準備的時候，大部分知識分子和文化人並不回應，他們並沒有因對租界外國勢力不滿而遷入特別市。

在情感地理的光譜上，租界主流文人菁英主義趣味非常明顯。1939年6月《魯迅風》雜誌對上海作家四個等級所作的區分也可以作為例證。亭子間作家明顯屬於第三四等，極其優秀者如夏衍（1900-1995）和胡風（1902-1985）才可以進入二等，無法望魯迅項背。⁴⁸ 因此沈從文在對「海派」文人畫像時，其中暗含著一種嘲弄與

⁴⁷ 張得：〈現代中國作家群〉，《文藝畫報》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頁11。

⁴⁸ 魏京伯：〈海派與京派產生的背景〉，《魯迅風》第16期（1939年6月）記載：（1）著名的頭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頗豐；除稿酬、編輯費以外還有出書及增印的版稅，以及其他來源，每月收入可達400圓（合

鄙夷：「舊禮拜六派的一位某先生，到近來也談哲學史也說要左傾」，「名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或遠談希臘，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亂猜詩迷者相差一間」。⁴⁹特別在「新月」的周圍，菁英文化人依然保持著驕傲的姿態。在激進的都市亞文化浸染下，上海的胡適一派也以「反動文孽」的姿態激烈批判國民政府侵犯人權、「黨權高於國權」，但這不失為一種苦口婆心的規勸。胡適認為，「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而政府也需要訓練」，這背後仍然是一種對菁英主義立場的堅守。在胡適領銜的《新月》周圍則聚集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紳士」，以「健康」和「尊嚴」作為文學評判的標準。儘管在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筆下，他們依然是一些「體面和高雅的文人……行將死亡的和頹敗的社會階級的知識貴族」。

相比而言，亭子間文人具有鮮明的都市青年亞文化特質。都市

今人民幣12,000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陸新村），房租每月至少60圓甚至上百圓；飲食豐盛，經常請客聚餐或家宴；每週都可娛樂觀劇等；出門乘坐計程車，如魯迅（除稿酬外，1927年末-1931年還由蔡元培舉薦兼任「大學院」特約撰述員，每月加300圓）、郁達夫、田漢、巴金（除稿酬外還加文學叢書編輯費每月200圓）、茅盾等。（2）二等作家已經成名，稿酬為千字3-5圓左右，可住三間房，每月房租20多圓，生活費至少160圓左右；月收入必須200圓（合今人民幣6,000元）左右，如成名後的夏衍、胡風。是一種典型的中間階層生活。（3）三等作家小有名氣，稿酬為千字2-3圓；若參加雜誌社可有編輯費；若已開始獨立出書，可有版稅收入。住一層前樓加亭子間，每月房租15圓左右，若住兩間房則月租金20圓以上，生活費120圓（合今人民幣3,600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頻、蕭紅、蕭軍的收入，從四等升為三等；夏衍、胡風（作品主要是譯述稿）、陽翰笙、周揚等一開始也是千字2圓，後來才升為3圓。這表明他們開始進入社會，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4）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廬的文學青年，稿酬為千字1-2圓，開始總是過著獨身生活，或者將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單槍匹馬在上海灘頭闖江湖，每月個人生活費及書刊費約20-30圓。一旦結婚成家，如何維持家庭生活呢？住亭子間房費10圓，大米、小菜、油鹽煤球等每月伙食費40圓，加上衣服、乘車、應酬（請客吃飯等），每月生活費需要60圓（合今人民幣1,800元）左右。仍屬於普通貧民，如葉紫、柔石、沙汀、艾蕪等。

⁴⁹ 沈從文：〈論「海派」〉，收於劉洪濤編：《沈從文批評文集》，頁10。

空間的陌生性、無限性為多樣化的亞文化群體提供了寄居的家園。其中一個重要的群體便是邊緣的學生和知識人群體。青年亞文化的激進姿態也是「跟著少年跑」這一時代風尚的折射。胡適說梁啟超（1873-1929）「這幾年頗能努力跟著一班少年人向前跑。他的腳力也許有時差跌，但他的興致是可愛的。」⁵⁰魯迅寧願自己肩負那「黑暗的閘門」，勸青年少讀或不讀中國書，而錢玄同（1887-1939）更主張將40歲以上的人全殺掉。年僅35歲的胡適慨歎自己也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老少年」。結果是「學生」與「老師」分化為兩個社群，學生群體中多有「自成一階級」或「自創一政派」的「學客」。⁵¹到1946年，聞一多自問道：中國的老師和學生「究竟是誰應該向誰學習？」「學生」與「老師」的分化逐漸演化為「青年」與「老人」之爭、「新」與「舊」之爭。從高長虹（1898-1954）表達以「青年」來傲視「老人」的優越感，到二〇年代末創造社青年文人以「老生」代稱魯迅，再到三〇年代楊學人給魯迅的公開信中以大量的篇幅寫到魯迅的老態，在他的學生的眼裡，魯迅在情感上儼然已經是「不中用」的老頭子形象，是需要被「浪子」們起來反抗的「浪子之王」。進而言之，魯迅以及五四權威文人所代表的文學體制及其政治經濟基礎更是需要被顛覆的對象。因此，以「新月」一派為代表的菁英主義者們，自然不太讚賞激進亞文化群體的「傷感」、「狂熱」和「偏激」，並且相信感情不經理性的清瀘是一股惡濁的清泉。徐志摩譏之為「無方向的激射是一種精力的耗費」。

（二）「遊民心態」與「群落生態」

亭子間的青年亞文化在情感地理上也有親近鄉土「遊民文化」的心態。上文已經提及瞿秋白注意到了流浪文人「薄海民」在都市空間

⁵⁰ 胡適：〈老章又反叛了！〉，收於鄭振鐸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204。

⁵¹ 楊蔭杭：〈老圃遺文輯〉，《申報》，1921年9月29日。

中的積聚。魯迅同樣深刻揭示了都市浪子的一種劣根性。魯迅與浪子之爭某種程度上也是城市啟蒙理性與鄉土遊民心態之爭、租界主流文人和亭子間文人之爭，也是一種地理身分的深刻衝突。

近代以來，由於中國科舉制度的崩塌，不僅傳統中國政治統治模式徹底被打破，而且連帶摧毀了傳統的中國鄉村結構。「自教育界發起智識階級名稱之後，隱然有城市鄉村之分。」⁵²城市自居於智識階級地位，因而輕視鄉村，進而產生了整體性的城鄉「文化之中梗」。由此，城鄉分化已是必然。而在恩格斯的住宅問題的分析框架中，住宅短缺問題其實就是城鄉對立的折射，是城鄉二元對立問題的表象。既然鄉土不再，兩千年作為四民之首的士人便不再是社會的軸心。知識青年的「離村問題」便異常突出出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也看到，鄉村一般知識階級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專想在都市上活動，都不願回到田園，專想在官僚中討生活，都不願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農村中絕不見知識階級的足跡，也就成了地獄。因而「中國農村的黑暗，算是達於極點」。⁵³從「鄉民到市民」的過程在通俗文學中多有展現。移民大量湧入都市，「城市病」劇增，例如房荒、失業、車禍、公共衛生的惡化、時疫疾病的傳染等等。在包天笑的〈鄉下人再到上海〉中，這位老農民和茅盾筆下的吳老太爺、魯迅筆下的阿Q一樣，城市在他眼中是充滿矛盾的混合物，讚美、羨慕、恐懼、鄙視交織在了一起。其實這位老頑固內心並不喜歡這裡的一切，火車月臺票不同的稱呼、電車的等級、商店對待顧客的親疏態度、社會的唯利是圖、娼妓的不知羞恥等等。對於普通鄉民尚且如此，對於文學青年來說，革命的挫敗、無根的失落加上都市的鬼蜮，自然讓他們和困苦的底層產

⁵² 章太炎：〈在長沙晨光學校演說〉，收於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下冊，頁823。

⁵³ 李大釗：〈青年與農村〉，收於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文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2，頁288-289。

生了一種天然的血緣關係。

客觀地說，亭子間文人的心態也不是真正的農民或者阿 Q 心態，它首先是一種邊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態。近代以來邊緣知識分子群體普遍存在著「求速之心」。黃克誠（1902-1986）從一心學業轉而「深入地探索國家、民族、社會、階級等問題」。閱讀各種報刊後，他認識到「不光是我一個人苦於無出路，整個中華民族都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於是「由過去為個人尋找出路變為立志為國家、民族、社會尋找出路」。於是「思想上似乎有了寄託，一掃過去那種苦悶消沉的精神狀態」。最後因感覺三民主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諸問題」，轉而「在國際的各種思潮之中選定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⁵⁴ 已經進入上海勞動大學就讀的周立波等人也因為鬧革命被學校開除貧病交加。這是一種雙重的失意與惆悵，他們與主流知識分子一道目睹了民族的危難與國家的敗亡，但卻沒有擁有魯迅胡適一樣的社會話語權。在國難和人生的雙重悲劇之中，轉而尋求一種更高的理想或曰烏托邦作為重要乃至唯一的精神寄託。這也是他們從思想到行動比其他任何階層更趨於革命的重要原因。

其次，這是這種「有嚴密組織的遊民心態」。亭子間中並不孤單，青年文人聚居在一起形成人文地理學上的「群落生態」(Biotope)。亭子間文人大多聚居在一起，自然地聚集在了周揚的周圍。歐陽山（1908-2004）住的北四川路一間亭子間中，張天翼（1906-1985）、沙汀（1904-1992）、朱凡（1909-1987）、蔣牧良（1901-1973）、韓起（1942-）、楊騷（1900-1957）等人時常聚會、彼此接濟。羅烽（1909-1991）、白朗（1873-1914）夫婦先與蕭軍（1907-1988）、蕭紅（1911-1942）同擠一間房，後又與舒群（1913-1989）、陳凝秋（1906-1988）同住法租界美華里一間亭子間。在丁玲租住虹口青雲路青雲里一間小亭子間中，瞿秋白（1899-1935）等人是這間亭子間的

⁵⁴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上冊，頁1-19。

常客，他們縱談古希臘、古羅馬和文藝復興，談普希金（Aleksandr Sergejevich Pushkin, 1799-1837）、徐志摩、郁達夫以及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爭論。⁵⁵ 亭子間文化具有鮮明的暗示和感染作用，並且被暗示的觀念有直接轉化為行為的傾向。在魯迅、郁達夫等人的人格魅力的號召下，一個個底層的文學青年個體在亭子間形成小型的聚居群落，直到最後團結在左聯周圍。由避免孤獨、謀得生存，到從集體中獲取力量，即使最終陷入到某種意識形態的迷狂，也堅信錯覺才是真理。特別是到了左聯後期，伴隨著魯迅在左翼文化運動中的日漸孤立，周揚及其追隨者則日漸成為左翼文化組織內的主流。周揚作為中共組織領導，從最合法和正統的方面獲得了眾多左翼文化「浪子」的認同和擁護。

這種空間權力的轉變過程是一種由「不佳的空間」轉向「不佳的內部空間」的過程。通過對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作品的分析，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1907-2003）指出了外部空間的不佳與內部空間的異化是文學創作和體驗的兩大障礙，而里爾克把他們凝練成一個超越的世界。⁵⁶ 但是，亭子間文人的文學道路卻把這兩種障礙推向了兩極化。在一種壓抑性的具象空間中，一種激進的批判試圖取代另一種生命形態，唯有掩蓋它們才能讓自己被看到。在這種被封閉的烏托邦的深處，其實他們被排斥在進入真理的真正入口之外。一種強迫對象必須服從自我的心情，讓自己親身成為具象的擁有者、生產者，結果是並不能超越障礙，而只求結果並貪求欲望，真正的自我被排斥在文學空間之外。這種不佳的文學內部空間是封閉的、排斥性的，缺乏反思精神的。亭子間很容易變幻成赫胥黎（Thoma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島」，一個烏托邦的孤島，進而墮入施密特式的專橫武斷，即衝動地劃定他們和我們、敵人與朋

⁵⁵ 張小紅：《文壇之光》（上海：百家出版社，2000年），頁79。

⁵⁶ [法] 莫里斯·布朗肖著，顧嘉琛譯：《文學空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29-130。

友之間的差別。

一種集體主義的「群落生態」更加容易被無意識所控制，具有容易衝動並被激怒的心理特質。空間上的局促導致壓抑憤懣繼而狂狷。集體心理學的研究表明，每一種情感，每一個行為都有極大的感染性，它甚至能使一個人欣然地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而服從集體的利益。這會造成性格的兩面性。一方面是順從權威，一方面又非常偏狹、不容人。成仿吾專門從日本請回國來的創造社的一批「革命青年」成了左右對魯迅等新文學作家批判的主導力量。一方面，他們襲用日本共產黨福本和夫左傾狂熱的「分離結合」方式，盲目清算／批判幾乎所有新文學作家，繼而通過片面理解的「奧伏赫變」（Aufheben）建立他們對社會歷史形勢的判斷與發展的理論基礎。魯迅對遊民心態的復活保有相當的警惕，順從權威的大眾雖然人數眾多但是卻心理偏狹，他說，「成仿吾們真像符拉特彌爾·伊力支（列寧）一般，居然『獲得大眾』；那麼，他們大約更要飛躍又飛躍，連我也會升到貴族或皇帝階級裏，至少也總得充軍到北極圈內去了。譯著的書都禁止，自然不待言。」⁵⁷

魯迅深刻揭示了亭子間文人的一種劣根性。建立在封建奴性基礎上的「暴民亂治」和「遊民意識」以新時代「大眾」的面目捲土重來，扭曲異化革命，「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⁵⁸換言之，浪子要求他們英雄應具備堅強、甚至暴虐的品格。革命的過程變成了要求他者受統治，受壓迫，要求對他的主宰誠惶誠恐。在勒龐（Gustave Le Bon, 1841-1931）眼中，這種集體症候從根本上講是完全保守的，它深深地厭惡發明和進步，對傳統懷著無限的崇敬之情。⁵⁹一些亭子間文人的革命不過是和傳統的「統治階級的革命」一

⁵⁷ 魯迅：〈「醉眼」中的朦朧〉，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4卷，頁66。

⁵⁸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第4卷，頁297。

⁵⁹ [德] 弗洛伊德著，林塵等譯：〈集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弗洛伊德後

樣「爭奪一把舊椅子」。如果奴才成了主人還是要做「老爺」。他們的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還大還可笑。⁶⁰可見，亭子間文化作為現代上海都市的新生兒，卻始終伴隨著一種「原始衝動」，這一衝動就是：回歸遊民運動的傳統。激進的浪子好像在反壓迫、反傳統、反抗不義、反抗皇權，其實是意在恢復壓迫和野蠻的傳統，製造著新的不義和另類的皇權。這一「另類皇權」是指革命者雖屬於距離皇權最遠的底層，但無論在心理結構、行動規範，還是在終極理想上始終以皇權為摹本。以往，全社會對於這一遊民亞文化缺少反思，還把它作為革命精神傳揚，實際上這是一把極易走偏的雙刃劍，會給改革與建設帶來意想不到的破壞。

亭子間文人的這種「新」、「舊」意識的轉換，折射了集體性心理學中一種心理原型的轉換過程。所以魯迅說民國元年已經過去，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 Q 似的革命黨出現。這些革命阿 Q 那黃黃的小辮上又增添了幾分上海灘洋場投機的氣息。阿 Q 式的劣根性隨時會重新在心理的河床上奔湧成大江。這符合激進派知識分子普遍的狂熱特徵。在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看來，這是因為激進知識分子缺少與某一階層的根本結合而迫切需要一種心理補償，而在列斐伏爾眼中，激進心態爆發的力度是有跡可循的，它的「力度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慢慢積聚起來的」。⁶¹要言之，亭子間文人的狂熱心態是空間本身的極度壓抑造成的劇烈反彈，借向傳統的遊民意識的復歸獲得一種擺脫物役的願望滿足。

從魯迅與周揚（1908-1989）的關係上，更加可以看出他們所處的「情感地理」上的不同。雖然鄭學稼也惡溢魯迅為亭子間「浪子」的領袖——「浪子之王」。但周揚才是事實上以「浪子之王」的身分

期著作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頁83。

⁶⁰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第4卷，頁297。

⁶¹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 1 (London: Verso, 1991), 202.

反抗魯迅的。周揚是亭子間裡真正的「土皇帝」。因此，魯迅在面對亭子間文人時常射來的暗箭時，只能保持「橫站」這一姿態。雖然他在亭子間文人之中始終保持了精神導師和生活接濟者的身分。但是1934年12月6日他卻在致蕭軍、蕭紅的信中不無悲憤地談到：「敵人是不足懼的，最可怕的是自己營壘裏的蛀蟲，許多事都敗在他們手裏。因此，就有時會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寫信給他們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的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的快意的笑臉。」⁶²此時正是周揚已經取得了左聯的領導權，而魯迅此時對於浪子們射來的暗箭滿懷「寂寞」、「悲憤」、「痛苦」，他稱周揚為「英雄」、「工頭」、「奴隸總管」、「元帥」，而自稱為「苦工」和「奴隸」。他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⁶³

維繫作為一種「群落生態」的亭子間需要一種力量，那就是「威望」。這是一種由一個人、一部作品或一些觀點點燃起來並且支配我們的東西。而勒龐區分了兩種威望，一種是獲得的威望，另一種是人格的威望。總結魯迅與亭子間文人群體的合作與分歧，我們發現，周揚的威望屬於前者，他是獲得體制認可的文學權力。在「四條漢子」階段前後，與魯迅、馮雪峰、胡風等人的矛盾更多地帶有宗派色彩，彼此的妥協、融合必不可少。而後期周揚與胡風、馮雪峰、丁玲（1904-1986）等人的鬥爭則裡挾著體制的權力來排除異己，維護自己的合法性和正宗地位了。1936年，周揚等人解散左聯，又不發表一個公開的聲明，同時另外重組「文藝家協會」，提倡「國防文學」，並誣衊魯迅「破壞統一戰線」。重病中的魯迅則不得不拍案而起，憤怒

⁶² 1935年4月23日致蕭軍、蕭紅，見《魯迅全集》，第13卷，頁116。

⁶³ 1935年9月12日致胡風，見《魯迅全集》，第13卷，頁211。

地揭露了浪子們「左得可怕」的本來面目。

相反魯迅的威望更多來源於人格威望。正如深知魯迅的日本學人增田涉所說魯迅對於「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隸地位的自覺，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覺相聯結的」。⁶⁴ 在魯迅眼中，左聯對於青年知識分子的熱情與青睞，亭子間底層文人圍繞左聯形成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運動，是因為這是一個能夠包含精神自由和個體差異的組織，個體的意志與組織的權力之間不應該存在根本性的衝突。而「奴隸總管」意味著對個體意志、個體自由的蔑視和剝奪。即使茅盾在參加了兩次全體會議後也感到「左聯」與其說它是文學團體，不如說更像個政黨。⁶⁵ 如果威望始終是一根橫在頭頂的「鞭子」，那麼魯迅的「反抗絕望」就是要抵抗這種錯覺，一種置於集團心理下以激進誇張掩蓋「潛伏著的數千年的精神創傷」。如果亭子間的這群「革命知識階級」實際上把革命看作爭取他們個人「最後的勝利」和「殊勳」的手段。那麼無論是他們對革命文學歷史譜系的構造與爭奪，還是對一般文學家的橫掃，都是「要『包辦』工人階級文藝代表的『事務』」，⁶⁶ 在魯迅看來，歷史與中國文人的命運始終就是在這種集體空間中的輪迴，「不是正因為黑暗，正因為沒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麼？」⁶⁷

（三）激進文學空間觀的内部差異

魯迅與亭子間文人的矛盾折射出左翼激進的文學空間觀內部存在的巨大分歧。魯迅一生對租界中的公寓保持好感，並且對亭子間的

⁶⁴ 王得後編：《尋找魯迅·魯迅印象》（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頁52-53。

⁶⁵ 茅盾：《我走過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中冊，頁56。

⁶⁶ 何凝（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收於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主編：《文學運動史料選》，第2冊，頁279-280。

⁶⁷ 魯迅：《三閑集·鏟共大觀》，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卷4，頁106。

「群落生態」和「公共空間」保有警惕和規避。於魯迅與亭子間文人的矛盾之中，我們更應當反思，情感地理如何決定了一個群體的文化傳統與精神家園。

晚清以來，從「個體解放」進而展開「公共空間」在啟蒙話語中是否是一種預設？而這一預設是否真的水土不服？換言之，近代以來，尋求明清文化中的「私欲」與「個人主義」的相似性，往往成爲底層知識分子倡行自由理念的最佳路徑。明末到清中期，李卓吾（1527-1602）、顧炎武（1613-1682）、黃宗羲（1610-1695）直到戴震（1724-1777）對「私」的正當性的辯護中，可以發現由於對皇權「大私」的質疑是隨著君民一體化統治的解體而出現的。這一民權思想，究其實質並不是抽象的平民思想，與其說這個「私」代表個人性的「私」空間，不如說指向「均分式」的「公」空間。亭子間中的邊緣文人仍然抱有以平均主義爲內核的樸素平等觀念，這是傳統農民革命思想在現代都市空間中的繼承和發展。

以此看魯迅與左聯關係的惡化，我們也可以辨別兩者文學空間觀的差異。魯迅更能代表回歸本體論的一種存在主義空間觀，而亭子間文化指向一種功利性、均分式的空間觀。魯迅的思想更親近於基爾凱·郭爾（So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強調「人之內曜」，「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知精神現象實人類生活之極顛，非發揮其輝光，於人生爲無當；而張大個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義也」。⁶⁸ 這是一種個人化的致命的自由，因爲這種孤獨是無證據的，也是無用途的。這種「文化偏至」的歷史辯證法把「人國」作爲一種價值理想。它作爲一種未來的烏托邦，意味著對一切壓抑或物化的社會秩序、文化形態和思想理念的否定。因爲即使面對亭子間浪子癡狂的人生攻擊，魯迅仍然堅持「我無佈施心」。正是基於對國民性的深

⁶⁸ 魯迅：〈文化偏至論〉，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卷1，頁54。

刻認識，魯迅才警覺到一種缺乏個人主體自覺的政治激情無疑最終會導致個性的壓抑。當極左傾向提出文學就是宣傳，而完全否定文藝自身的藝術個性的時候，魯迅在〈文藝與革命〉中則明確地說，一切文藝固是宣傳，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

反思如上分歧，我們讀出魯迅的這一聲吶喊是無力的。從五四以來，個人解放雖然如大河澎湃，但是集體主義傾向也已經暗流湧動。以胡適的看法，這一現代思想的分期應該在1923年，前一段是「側重個人的解放」，後一段則屬於反個人主義的「集團主義時期」。⁶⁹羅志田仔細考察後則認為，1919-1925年間是兩種傾向「並存而競爭的時期」。⁷⁰雖然並存並進，畢竟「集體」漸漸佔據上風。五卅運動之後，「個人」則基本喪失競爭力，終不得不讓位於「集體」，這其後才有北伐的突進乃至左翼運動風行。問題是，走向激進的亭子間文化最終要求所有人忘記它的孤獨，而魯迅在這種孤獨之中才可以了解人的自由，他的存在直到死亡，並向死而生。亭子間文化「只有」階級性無疑是對「唯物史觀」「糟糕透頂」地歪曲，最終在「革命」的旗號下製造了新的奴役。自我在人群中消失，被新的「大眾」的文化淹沒。製造這種「知識恐怖」的文學家「專用造謠，恫嚇，播弄手段張網」，並且「羅致不知底細的文學青年」，其最終目的無非是「給自己造地位」。均分式的私欲，取消了「己」的孤獨，「群」的症候反而突顯了出來。這種「激進的革命論者」，往往是「非革命」的。這也是在亭子間孕育出的激進人文地理學的典型特徵，是魯迅與亭子間文人情感地理的主要分歧點。

⁶⁹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冊，頁256-257。

⁷⁰ 羅志田：〈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45-146。

四、空間轉向與邊緣知識人的認同困境

通過情感地理的視角理解魯迅與亭子間文人的分歧，讓我們辨清了文學空間的內部差異。這一差異更多地是指向存在論的，指向一種布朗肖所謂的文學空間不佳的「內部」，一種對國民性認知的差異。這是一種對精神深處的內在障礙認知的差異。但是，我們還必須跳轉出來，來看看亭子間文化的「外部空間」。具體地說，就是探討租界外、棚戶區、山頂上、窯洞裏與亭子間的空間關係，唯有如此我們才可以理解亭子間文人生活其中的一整套社會關係。在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眼裡，「這些關係勾畫了各種場址的輪廓，彼此無法還原，也絕對不能疊加」。⁷¹ 在這些具體場所，在鄉村、城市和飛地之間，存在著一種多極的文化，本文試圖深入每一種文化空間內部細加分割與比照，借此把握邊緣知識人認同困境的歷史根源，以及身分危機背後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補償與異位。

（一）租界、山頂上、棚戶區與模糊的主體性

租界文化在上文已經做了比較詳細的探討，在此不必贅言。亭子間文化作為一種象徵性的文化定位則來源於三〇年代以後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在他的兩次講話中，亭子間、山頂上和窯洞裡獲得了不同的身分定位，左右了之後的理論和路線鬥爭，其影響至今餘脈未絕。

1938年4月10日，在魯迅藝術學院成立大會上，毛澤東〈統一戰線同時是藝術的指導方向〉首先把從上海來的左翼知識分子稱作「亭子間的人」，把來自井岡山等革命根據地的文化人，稱作「山頂上的人」。毛澤東以其慣有的民間風趣語調說：「亭子間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吃，山頂上的人弄出來的東西有時不大好看。」

⁷¹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Jay Miskowicz tran, *Diacritics*, (1986 spring): 23.

有些亭子間的人以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頂上的人也有擺老粗架子的，動不動，『老子二萬五千里』。⁷²毛澤東對這兩類文化工作者作了比較明確的劃分，指出其長短，意在指出藝術指導方向是統一戰線。因為這一時期，蘇區「山頂上」和上海「亭子間」裡兩條戰線的一些文化工作者匯集於革命聖地。除了經過長征的蘇區文化工作者，如成仿吾、李一氓（1903-1990）、李伯釗（1911-1985）、洪水、危拱之（1901-1973）、徐夢秋（1895-1976）等早已到達延安，原上海中央局文委所屬各聯的理論家、作家、藝術家，如丁玲、艾思奇（1901-1966）、周揚、李初梨、張庚（1911-2003）、崔嵬（1912-1979）、江豐（1910-1982）、呂驥（1909-2002）、蕭軍（1907-1988）、劉白羽（1916-2005）等也大批先後抵達革命聖地。大革命以後「亭子間」（國統區左翼文藝運動）和「山頂上」（蘇區）的工作各有成果，但是在他們之中存在著文人相輕和「自大主義」。而對於即將開創的「人民大眾文化」來說，這都是要不得的。這個時候，作為統戰對象的亭子間文人的準確定位其實並未破題。

直到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才更進一步說：「同志們很多是從上海亭子間來的。從亭子間到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歷史時代。一個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⁷³毛澤東在這一重要講話對亭子間文人的定義已經不再局限於藝術風格、寫作姿態乃至權力話語的界定，而是一種階級分野的甄別。空間上的局限指向了歷史意識的分化，亭子間與山頂上以及後來的窯洞裡是不同歷史時代的產物。如毛澤東所說，這是一個中國歷史幾千年空前未有的人民大眾當權的時代，我們周圍的任務，我們宣傳的對象，完全不同了。換言之，單個主體不可能也不應該再盲目地尋找避難所，因為這個時代不再需要純粹個人的、絕

⁷² 毛澤東：《毛澤東文藝論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頁13。

⁷³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卷3，頁876。

對心理的救贖。任何文化只有在一種偉大的集體統一體中加以重新述說，並且必須共有一個單一的基本主題。這個主題便是馬克思所說的，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集體鬥爭歷程。但是亭子間文人並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歷史和政治無意識。也就是說，一切文學既是社會的歷史的，但是說到底都是政治的。丁玲和王實味（1906-1947）都未能從這一束縛中有效地解脫，結果釀成歷史的悲劇。「山頂上的人」固然被毛澤東批評「擺老粗架子」，但那是權力依託下主宰符碼闡釋優越性的展示；「亭子間的人」無疑也以爲「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但正如魯迅所言——那畢竟是詩歌的力量，在槍炮面前當不得真。

問題是亭子間作家群體雖然生活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匯聚的上海，但是他們真實的經濟地位卻和棚戶區的勞苦民眾沒有大的區別，但爲何他們又持有「老子天下第二」的自大心態呢？上海長年房荒造就的以住房空間區別社會身分的歷史因素不容忽視。在上海，一般而言從工人們的不同居處來區分他們不同的經濟地位：

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研究得出這樣的結論：上海工人住房類型主要有三種，即里弄房子或石庫門房子、老式平房、棚戶區。在對76,218間工人住宅的調查中發現，里弄房子也是上海小市民的典型住宅，占37%。這類房子上海隨處可見，是大約一半的上海工人和他們家庭的住宅。……住在石庫門房子裏的工人家庭與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階級弟」——臨時工、長工、各類沒有技術的勞力有很大的不同。後者因爲貧困，只能在城市邊緣聚居，被住在石庫門而心滿意足的小市民輕蔑地稱爲鄉下苦力或「鄉巴佬」。⁷⁴

正因爲「上海居、大不易」，而能夠「逃離棚戶區」的往往是因

⁷⁴ 盧漢超著，段煉等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的上海》，頁51。

爲有了工作和固定職業。即使住在極端逼仄的亭子間也會覺得高人一等。雖然距離「懷有貴族般的心態」還有差距，但是「維持著精神上的菁英狀態」卻與貴族並無二致。如盧漢超所說，亭子間作者的特點是：敏感，自負，看不起周圍的一切但又無法超然世外……。正是因爲他們住在石庫門里弄，其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些不同的都市的氣氛。在談到周揚的時候，夏衍說：「周揚的變化很大的」。三〇年代在上海，「他很瀟灑，很漂亮」，「愛去跳舞，跟我們一起上咖啡館，看電影」。「主要是去延安之後，也就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周揚顯然變了很多。」⁷⁵1927年1月29日，郁達夫「搬家」至閘北寶山路三德里A11號創造社出版部二樓亭子間。除工作、寫小說外還狂熱地追求王映霞，出入書店、影院、酒館、茶樓、咖啡館、旅社、澡堂、妓院、甚至在醉後和葉鼎洛一起去四馬路「打野雞」。1928年2月的〈〈達夫代表作〉後序〉中，錢杏學依據經廚川闡述的諾爾度的精神分析學說稱讚郁達夫爲「很健全的時代病的表現者」。⁷⁶廚川的論說係匈牙利精神病學家諾爾度（Max Nordau，1849-1923）的理論，錢引用了廚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中「近代人生活」一章有關「世紀末」病態的種種症候的描述。在1930年的《丁玲》中，錢再次引用同一段論述，爲“Modern Girl”們開出一份頗具精神分析色彩的「世紀末」病症診斷書。以此看，亭子間文人與山頂上和棚戶區群體的摩擦是內生並且難以避免的。如他們所說，「熱心的著作家，滴盡了他們同情的心血，嘶竭了他們的沉痛的呼聲，但他們最關心的一般民眾，卻只是瞠目結舌，不知道說的是什麼」。對封建小市民抱有鄙夷的心態也是自然：「其實說一句老實話罷，中國的讀者社會，還夠不上改造的資格呢！」⁷⁷可是歷史的弔詭之處在

⁷⁵ 李輝：〈與夏衍談周揚〉，《往事蒼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頁234-237。

⁷⁶ 錢杏學：〈〈達夫代表作〉後序〉，《現代中國文學作家》（上海：泰東圖書局，1928年），卷1，頁101-103。

⁷⁷ 西諦：〈最近的出產·本欄的旨趣與態度〉，《文學旬刊》第37期（1922年

於，他們嘲笑的「封建小市民」後來居於「革命的領導階級」。按照階級分析法的邏輯去「判定」：菁英作家大多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他們嘲笑部分工人為「封建小市民」的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正是他們將來要好好改造的「證據」之一。

要言之，亭子間文化人與身處租界的菁英文人、身處蘇區的革命文人和身處棚戶區的市民群體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空間隔閡，這造就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模糊並且激進的主體性。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蕭軍、丁玲等人在理解毛澤東《講話》時心中的無奈與錯愕。這種在菁英與大眾之間的徘徊心態，不僅影響了左翼文學激烈地大眾化轉向，更觸發了亭子間文人群體的命運轉折。

（二）知識分子邊緣化與無所依附的「智識階級」

亭子間文人的困境是近代以來知識分子邊緣化的一個側面。對這樣一種社群的界說，傳統中國的士農工商既不適用，近代西方的社會分類標準也覺勉強，因此余英時、羅志田等學者認為倒不如明確其為城市邊緣知識分子：

近代以還，由於上升性社會變動的途徑多在城市，邊緣知識份子自然不願認同於鄉村；但其在城市謀生甚難，又無法認同於城市，故其對城鄉分離的情勢感觸最深。他們不中不西，不新不舊；中學、西學、新學、舊學的訓練都不夠系統，但又粗通文墨，能讀報紙；因科舉的廢除已不能居鄉村走耕讀仕進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進」甚至謀生的本領；既不能為桐城之文、同光之詩而為遺老所容納，又不曾做「八行書」以進人衙門或做漂亮驕文以為軍閥起草通電，更無資本和學力去修習西人的「蟹行文字」從而進入留學菁英群體。他們身處新的城市

與衰落的鄉村以及菁英與大眾之間，兩頭不沾邊也兩頭都不能認同——實際上當然希望認同于城市和菁英一邊而不太為其所接受。⁷⁸

亭子間文人半新半舊、不中不西，無法謀生於城市，更不能認同於鄉村。這一邊緣社群的認同困境正是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兩頭不沾邊、兩頭不認同」形象的倒影。梁啟超《新民說》直指，「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在民為蠹，在國為蟲。」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致毛澤東的一封信中說：「所見高明一點的青年，多帶一點中產階級的眼光和國家的色彩」。⁷⁹這一高明一點的青年正是五四白話文社會的產物。他們是城市邊緣的知識人。在文學革命中，他們著意追隨菁英，但他們更加看重由自己代菁英向大眾布施啟蒙的真理。羅志田進而指出，這樣的中介功用可能部分彌合兩者的疏離，但有時也可能造成雙方虛幻的接近感，因此其中不乏「迷思」的成分。⁸⁰文學革命很容易存在與「一般人」疏離的傾向，從而演變成菁英才子的上層革命。因此，無論在魯迅的《祝福》還是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中的那個「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處於社會夾層中的「中間物」。在魯迅看來，即使是左翼作家也還都是「讀書人」，是「智識階級」，他們要寫出「革命的實際」是很不容易的。

「智識階級」既不同於統治階級，也不屬於「民眾」。這與俄羅斯民粹主義的表述基本一致。知識分子與人民一直是兩個各自獨立的主體。在啟蒙理性之下，「人民」雖然有時候被指向「全體人民」，但大多數的時候則傾向性地指代那些「鞋匠」，那些生活在社會下層的賤民。在俄羅斯，知識分子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沙皇政權的力量和人

⁷⁸ 羅志田：〈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份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份子的興起〉，《開放時代》1999年第4期，頁16。

⁷⁹ 湖南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131。

⁸⁰ 羅志田：〈文學革命的社會功能與社會反響〉，《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87。

民自發的力量。後者對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隱秘的力量，知識分子與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負於人民，它希望為人民服務。因此，十九世紀六〇年代俄國貴族掀起了「到民間去」的著名運動。由是觀之，毛澤東對於亭子間文人的定性並非空穴來風，它和五四時期中國文人群體自我反省和俄羅斯民粹主義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和俄羅斯知識分子面對西方現代化時的複雜心情一樣，中國的知識分子既渴望進入一個富強繁榮的歷史新階段，但對這個資本主義新社會帶來的諸多病態，諸如貧富差距、道德淪喪、社會腐敗、傳統敗壞充滿了恐懼、躊躇和抵觸。因此，他們希望通過「到民間去」歸附於農民，借助道德和宗教的力量規避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陷阱。

其實，亭子間文人在走向延安以前就深陷無所依附的困境。魯迅認為「左翼作家很容易成為右翼的」，在左翼作家隊伍裡存在一批「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⁸¹ 亭子間文人內部的分化早已不可避免。一部分作家從提倡、創作現代主義文學漸漸向左翼靠近，如郭沫若、茅盾、丁玲等人。另一部分人，以蔣光慈、穆時英、施蛰存（1905-2003）為代表，從積極地提倡、實踐左翼文學，漸漸地退出左翼陣營，走向現代主義。魯迅、郭沫若前期的創作帶有鮮明的現代主義特徵，而後期則為左翼文學立下了標杆。穆時英由「普羅文學之白眉」變成了「新感覺派的聖手」也集中展現了文學現代性的兩條道路。

這一知識分子的「社會學問題」一直就是邊緣文人頭頂的達摩利斯之劍。曾寫作〈亭子間中的文士〉的郭沫若沒有「山頂上」的革命鬥爭經驗，當他走向無產階級文學，意圖實現方向性的過渡時，自然會受到那些山頂上的人的質疑與排斥。對此，他們進行了自我辯護，聲稱要完成從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從右翼文學到左翼文學的轉變，最重要的是要完成階級意識的轉變。有了「作家的無產階級化」的內

⁸¹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收於人民文學出版社編：《魯迅全集》，第4卷，頁299。

部要求，才有了知識分子的自卑意識和對人民的崇拜，知識分子普遍地產生了「人民化」的思想，紛紛試圖通過某種方式轉化自我，躋身人民的行列，獲得「人民的身分」。但是即使如此，亭子間文人作為最為典型的「無社會依附的知識分子」很難輕易獲得認同。在『《中秋》風波』中，魯藝戲劇系第三期學員劉因創作了一部四幕話劇〈中秋〉，其細節刻劃、人物塑造、語言表現都得到了知識分子上下的欣賞，並被作為學習斯坦尼體系的實驗標杆，精心排練半年。結果事與願違，工農出身的軍隊幹部十分不滿，甚至有人看完後罵著走出劇場。⁸² 這些談論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契柯夫（Anton chekhov, 1860-1904）、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的「高級文藝」不受工農群眾的歡迎，不符合他們的口味、興趣和欣賞習慣。

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 1868-1958）和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在社會學上將「無社會依附的知識分子」，定義為一個不安定的、只有相對階級性的階層。知識分子先天具有動搖性，激進的知識分子更因其沒有歸屬感所以更需要「克服別人對自己的不信任，也克服別人對自己的不信任」。⁸³ 隨著丁玲等人迅速走向工農群眾，從《中秋》到《兄妹開荒》，再到《夫妻識字》、《白毛女》等延安經典文本風行，秧歌文化完成了對都市文明的全面壓制。這種轉折不僅如一些學者所言，是政治權力話語規訓的結果，代表了延安文學生態環境的客觀規定性，更折射出亭子間文人與山頂上文人文空間與階層差異背後主觀的焦慮和渴望。

⁸² 王培元：《抗戰時期的延安魯藝》（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72。

⁸³ [德]卡爾·曼海姆著，黎鳴等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頁155。

(三)「亭子間」與「窯洞裡」的歷史「中間物」

更具體地說，在毛澤東講話之後，亭子間文人面臨的問題是怎麼轉變成「窯洞裡」的文人。知識分子「有機化」的途徑就是認識到「人民是誰」。「人民是誰？首先是農民，部分地是城市的市民群眾，其次才是工人」。⁸⁴明智的選擇就是「屈尊俯就」，走向農民。這一選擇也是作為歷史「中間物」的邊緣知識分子無奈且必然的選擇。

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也在於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⁸⁵因為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這和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對知識分子的反思基本相同。無論是統一戰線還是「雅各賓式聯盟」都需要兩個因素，一是知識分子的思想與道德改造，二是民族大眾的、革命的文藝與新語言的創造。只有這樣，傳統的知識分子才能從封建的、神學的、資產階級的禁錮中走出來，與農業社會中的賤民階層結合，成為革命的「有機知識分子」。因此這一空間意識的轉換是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性因素。否則無以激發、喚醒分散的、被剝奪了話語權的賤民階層的覺醒。如同徐特立告訴斯諾的那樣，「從文化上看，這裏是地球上最黯淡無光的地方之一……這裏的農民與江西的民眾相比的確非常落後……我們不得不一切從頭開始。」⁸⁶對於葛蘭西和中國革命，這種知識分子與賤民的有機聯繫在最終的勝利到來之前的「漫長過渡期」中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窯洞裡」因此也成為毛澤東知識分子改造理念最貼切的實驗場。

讓我們還是回到左翼知識分子空間地理的轉換問題上來探求「亭

⁸⁴ [俄] 列夫·托洛茨基著，劉文飛等譯：《文學與革命》（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年），頁2-3。

⁸⁵ 毛澤東：《五四運動》，《延安文藝叢書·文藝理論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37。

⁸⁶ [美] 埃德加·斯諾著，宋久等譯：《斯諾文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1卷，頁193。

子間」與「窯洞裡」的差異性。地理意義上「窯洞裡」所在的陝北，確切地說應該是指包括延安、榆林兩個地區的碩大黃土高原群，它北連毛烏素大沙漠，南接渭北旱原，西越子午嶺與隴東相望，東隔黃河與晉西為鄰，總面積約82,760多平方公里。由於地殼運動及歷代的濫墾濫伐，土原表層地形破碎，溝壑縱橫，幾無平地；同時風沙日烈，亢旱無雨，植被絕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這樣描述道：「陝北是我在中國見到的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無窮無盡的斷山孤丘，連綿不斷，好像詹姆斯·喬伊絲的長句，甚至更加乏味。」⁸⁷可見，「窯洞裡」建築在中國最為貧瘠堅忍的土地上，它與煙雨江南、十里洋場中的亭子間有著天壤之別。然而更為殘酷的一面在於「窯洞裡」的人文地理的極端乏味。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達99%，學校教育，除城鎮外，在分散的農村方圓幾十裡找不到一所學校，窮人子弟入學無門；文化設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衛生條件極差，缺醫少藥，人畜死亡率很高，嬰兒死亡率達60%，成人達3%；全區巫神多達2,000人，招搖撞騙，危害甚烈。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⁸⁸

連年軍閥、土匪、武裝流寇的侵襲不僅鑄就了困苦的民情，更加劇了空間的壓迫與反抗。在地理歷史的不平衡發展中，那種階級、民族、性別、出身的差異都可以被當然地看做是一些「野蠻的造設」。「因為交通之阻塞，政治之黑暗，教育之落後，人民生計之困難，陝北甘東交界地區之農民，已養成一種反政府的心理。」自劉志丹（1903-1936）領導人民鬧革命以來，「民眾心中，只知有『蘇維埃』、『瑞金』、『莫斯科』、『列寧』、『斯大林』，而不知有『西安』、

⁸⁷ [美]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頁54-55。

⁸⁸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下冊，頁566。

『蘭州』、『北平』、『南京』等名詞」。⁸⁹ 列斐伏爾將這種由「野蠻的造設」激發的反抗看作差異的社會生產和空間生產以及再生產過程。正是因為空間壓迫的野蠻性，狂歡的激情才得以在日常生活中聚集，而爆發的力度往往與殘酷性成正比。正如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感歎說：「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裏，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鬥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徵。」⁹⁰

在這個霸權與反霸權彼此交鋒的空間中，中國的文化政治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轉向。早期以亭子間文人為代表的左翼文化運動是五四啟蒙運動的延續，它帶有自由主義、人文主義和現代主義的傾向。這是魯迅、蕭軍、蕭紅、丁玲、劉呐鷗、穆時英（1912-1940）等等不同取向的先鋒文人雲集左翼原因。雖然其中也蘊含著一些激進的因子，但是它仍然以傳統作為反抗的立足點，強調平等、人權和民主等等普遍性法則。此時以周揚為主導的左翼內部的包容性特徵試圖彌合差異，不管這個差異來自何處。但是，隨著亭子間文人向窯洞裡文人的空間轉場，伴隨著許多軸心激烈地競爭，在歷史—地理層面社會性權力的差異出現了兩極分化。反霸權的文化運動首要目的不再是消滅差異和均等，而是要把差異性凝固成一個共同信念，以獲得一致、認同和鬥爭的基礎，其目的是要根本上反對現存的權力關係，建設一個鄉土烏托邦。

這一文化身分政治的重構從「最近的地理」——身體出發，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調控，構造主體福利與政治制度的互利性，最終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秩序與文學秩序。如蔡若虹所說，窯洞在生活方式和思想作風上和亭子間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生活上是戰時共產主義供給制，組織上是軍事化或準軍事化的管理方式，亭子間的「自由人」成了

⁸⁹ 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香港：三聯書店，1980年），頁76。

⁹⁰ [美]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頁210。

「公家人」。蕭軍雖然避免了王實味的悲劇，但是當他試圖以「下鄉」的儀式表達亭子間文人的自由精神時，他才發現脫離「公家」的生活無以為繼。這是一種空間政治對於「福利」(welfare)的壟斷和關切。這種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眼中的「生活政治」通過創造能夠促進自我實現、道德上無可厚非的生活方式。「生活政治」以「我們應該怎樣生活」為基本理念，在這一理念指導下，表現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政治。這一「生活政治」表現為「工農幹部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其弊病在於最終的結果是「生活標準化」。趙超構對「標準化」的觀察是，「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在有些問題上，他們的思想，不僅標準化，而且定型了。」究其原因，他認為主要是因為「生活標準化，對於生活的希望、需要、趣味、感情等等也逐漸趨於統一。這是由於生活決定了意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⁹¹這是一個作為「近端秩序」的身體、生活與「遠端秩序」(文藝體制、政治體制)相契合的過程，唯有如此才可以實現合法性為基礎的權力。這一文化的權力並不一定以內在價值為基礎，而是要以承認、同意它的人的積極期望為基礎。

如果說早期胡適的「國語的文學」意在通過建設性的文學革命融合「他們」與「我們」達成「全國人民」的話，那麼「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則是徹底地實現了啟蒙的倒轉。胡適認為，晚清和民初兩次白話文運動有很大的區別。胡適說，前者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去吃罷。」儘管余英時為其辯解稱，胡適關於「我們」和「他們」的分別是「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經驗」。但胡適「在美國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禮之後，至少在理智的層面上已改變了『我們』士大夫

⁹¹ 趙超構：〈延安的標準化生活〉，收於任宏、高梅編：《精神的魅力：延安生活往事》（濟南：濟南出版社，2005年），頁45。

輕視『他們』老百姓的傳統心理。」⁹²但是，胡適所代表的知識分子的菁英主義關懷亦非常明顯。雖然從李大釗（1889-1927）〈庶民的勝利〉到蔡元培（1868-1940）的〈勞工神聖〉，勞工崇拜已經萌芽，但是胡適等人的「知識分子」觀念仍然是主流。例如對於王國維之死，顧頡剛認為，「這就是他不肯自居於民眾，故意立異，裝腔作勢，以鳴其高傲，以維持其士大夫階級的尊嚴的確據」。而這種疏離民眾的思想是「我們絕對不能表同情的」。⁹³

舊學之中存天理、去人欲舊格局無需改變，但「天理」不再是舊道德。從《鄉甲約》中的「糾過簿」到明清「省過會」，再到「批評與自我批評」，傳統理學中的「以聖望人」思想在亭子間文人人民化的過程被重新落實。章太炎（1869-1936）〈革命之道德〉曾經從道德標準出發，將社會分為十六個等級，第一等級便是「農人」，第二是工人，而「通人」以上多不道德。「知識愈進，權位愈伸，則離於道德也愈遠」。⁹⁴與章太炎一樣，毛澤東批評亭子間文人「老子天下第二」也是暗指這一菁英主義的思想殘餘，與手上有糞、腳上有屎的農民相比，這恰恰就是「不乾淨」，有必要接受工農群眾的思想改造，以便在精神上和靈魂深處受到磨鍊、洗滌和淨化。⁹⁵早在「少年中國學會」中，毛澤東便發起為每個人洗衣服，每次一枚銅板，以實踐北京工讀團將「工人」與「學者」合二為一。這體現了文學革命與生俱來難以自拔的歷史困境。知識分子既要啟蒙大眾，但卻難以追隨大眾，歷史使命卻賦予其指導大眾。這註定了覺醒的知識分子雖然是

⁹²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於歐陽哲生編：《胡適文存二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第2卷，頁192；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收於胡頡剛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第1冊，頁26-27。

⁹³ 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文學週報》，1927年8月7日，頁10。

⁹⁴ 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收於朱維錚、姜亮夫編：《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03-312。

⁹⁵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談話〉，收於《毛澤東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卷，頁851。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最初體現者，但他們無法成為這一勝利的最終體現者。譬如狂人、瘋子和魏連受，孤獨、決絕始終附著在邊緣知識人身上，這是一種以樂觀主義為底色的悲觀主義的人生觀。這才有了城市邊緣知識分子自認「我很慚愧，我現在還不是一個工人」⁹⁶漸成時代風潮。1949年後，亭子間文人周立波仍長期堅持生活在農村，繼續完成思想改造的任務。

走出亭子間的邊緣知識人的順利轉化，除與民粹思潮密不可分之外，更與中國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密切相關，是傳統文人實用理性的體現。亭子間「浪子之王」周揚努力扭轉心中的「都市慣性」轉而推崇孔厥（1914-1966）的小說，在他看來作者「由寫知識分子（偏於消極方面）到寫新的、進步的農民」，「寫出了農村中的新的人物、新的事情」，表現了「新的主題」，這種題材的「轉向」，乃是作者創作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進展」。周揚高度讚揚鬧得「熱火朝天」的秧歌劇，是由於這些秧歌劇表現了「新的群眾的時代」。趙樹理的小說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因為他是「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小說創作是「實踐了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的結果」。丁玲等人創作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荷花澗》、《小二黑結婚》、《王貴與李香香》和《新英雄兒女傳》中，程仁、張裕民、趙玉林、郭全海、水生、小二黑與小芹等等不是心繫集體、大公無私的先進農民，就是積極向上、朝氣蓬勃、集農民與戰士於一身的農民「新人」。但是「窯洞裡」文人筆下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卑微的、自私自利的，甚至墮落為危害革命的叛徒。他們不僅脫離生活實際、誇誇其談，還奉行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本本主義，不了解農民卻在農民面前長篇大論，搬弄學術名詞。知識分子形象的「汙名化」，啟蒙與被啟蒙的適時倒轉，體現了先驗的理性在知識分子群體中並沒有市場，而依附於歷史建立起來的、與經驗相

⁹⁶ 〈施存統致軼千通訊〉，《民國日報》，1920年4月16日。

關的、與現實生存生活相關的歷史理性才是他們行動的指標。

因此，亭子間文人為代表的邊緣知識人註定是一個歷史的「中間物」。他們既是「先覺的精神戰士」，但也是魯迅眼中「不三不四的作者」和「應該和光陰偕逝」的「中間物」。從二〇年代追隨菁英知識分子尋找和建立「科學人生觀」和「唯物史觀」，到三〇年代追隨左翼明確以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到四十年代與工農兵相結合，亭子間文人的生觀和人生道路一步一步具體化的同時，其身分認同卻越來越偏離知識分子「想像的共同體」。胡適的「科學人生觀」和共產主義的革命道德可以暗通款曲，而邊緣知識人早年所信奉的杜威「實驗主義」同樣可以用來指導「知識分子大眾化」的改造實驗，天地國親師中的那個「精神大我」轉化成了世俗生活中的偶像崇拜。這個歷史的「中間物」是鄉願和大盜之間的「中間物」，也是覺醒者和群眾之間的「中間物」，是欲望個體和「精神大我」之間的「中間物」。

總而言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中象徵體系一旦建立，文學實踐便會容易走向「誤識」。即知識分子並不認為他們意識是外在強加的，而是自我認可的。這是一種從外在空間到內心秩序的雙重邊緣化危機。知識分子的邊緣化既是外力使然，也是一個「生活政治」潛移默化、自然地自我表達過程。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和民粹主義共同把邊緣知識人揉捏成了歷史的「中間物」。

五、結語

總而言之，與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所論及的愛欲和文明的互生關係相似，文學與空間也存在著密切的互生與轉化關係。都市文學既是空間正義問題的重要表徵，也是實踐空間正義的重要力量。作為亞文化飛地的亭子間既不屬於城市，也不屬於鄉村。亭子間文學是關於人類願望的景象，象徵著一個被改變的世界。這其中孕育著一種更好生活的白日夢。在都市中心之下，總有一位從內部

來瓦解城市的神秘人物，一個狄奧尼索斯。上海的亭子間媲美於品欽（Thomas Ruggles Pynchon, Jr, 1937-）《拍賣第49批》中的特里斯泰羅、T.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的荒原、菲茨傑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大灰谷，這個潛伏的力量始終存在，他們或是憤青、或是異端或是神秘組織，也可以是一種地方主義的信仰。這一青年亞文化既含有個人的或者潛意識的抵抗壓抑的衝動，也可以通過文學實踐把這一衝動擴張為一種社會欲望，這種社會欲望最終轉化成了理想化的集體關係形式——以左聯為中心的左翼文化運動。以此為基礎，文化運動促發了一場深刻的從下而上的空間權力轉移。文學生產與空間生產在中國完成了最初的一場驟變。

上海都市亞文化的情感—空間—身體結構的包容性特質刺激了左翼風潮的風行，邊緣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領域走向崛起。雜糅感在賦予都市文化「多元化」和「異質性」的同時，也生產出一個「抵抗的空間」。激進的亞文化社群以「遊民心態」召喚彼此，獲得認同，並在「群落生態」的掩護下完成了社會關係的構建。在現代上海的公共空間中，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空間觀：主流文人的「私」空間與邊緣文人「公」空間。主流都市文化與激進都市亞文化之間內在分歧在於：宣傳不可替代文學，文化中的「群體情感」不能完全替代「個體情感」，而均分式的「公」空間更不能覆蓋守護孤獨的「私」空間。基於對國民性的深刻認識，魯迅警覺到一種缺乏個人主體自覺的政治激情最終會導致個性的壓抑。這折射了都市亞文化群體在人文地理上的深刻分歧。

邊緣知識人從亭子間到窯洞裡的空間轉換，並最終掌握了革命的文化主導權，他們卻因此走向了另一種更為深刻的邊緣化。棚戶區、山頂上、窯洞裡與亭子間的「空間摩擦」造就了一種激進的主體性，這一激進的主體性為了解「無所依附」的恐懼迫切需要訴諸於激進地自我貶抑。在俄羅斯民粹主義和傳統實用理性的雙重衝擊下，在「生活政治」的潛移默化下，邊緣知識分子完成了自身的有機化。

這一轉變進一步坐實了知識分子作為歷史的「中間物」這一概念，也驗證了魯迅、胡適、傅斯年等五四知識人早年流露出的對於知識分子認同困境的擔憂。在左翼知識分子面對雙重邊緣化危機的同時，都市文明成為被驅魔的對象，啟蒙者與被啟蒙者的身分發生了轉換。租界中、棚戶區、山頂上、窯洞裏與亭子間的「空間轉向」勾勒出現代中國激進人文地理演進路線圖，也因此預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轉折。「老子天下第二」焉知是戲言，無奈卻一語成讖。其後幾十年間，在這自傲和自卑的兩極心態之間，一種無所皈依的邊緣心態就像那文學史裏難以捉摸的幽靈，更確切地說，他是一個亭子間裡走出的遊魂。

徵引書目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 王文英、葉中強：《城市語境與大眾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間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王汎森：《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譜系》，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
- 朱維錚、姜亮夫編：《章太炎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余英時：《余英時文集》（十卷本），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李澤厚：《李澤厚集》（十卷本），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 李輝：〈與夏衍談周揚〉，《往事蒼老》，廣州：花城出版社，1998年。
- 周立波：《亭子間裏》，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
- 周揚：《周揚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
- 胡頌平編：《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 徐公肅、丘瑾璋、蒯世助等：《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章清：《亭子間：一群文化人和他們的事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葉中強：《上海社會與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 熊月之編：《上海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蔡若虹：《上海亭子間的時代風習》，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盧漢超著，段煉等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羅志田：《變動時代的文化履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
- 〔法〕亨利·勒菲弗著，李春譯：《空間與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 〔法〕米歇爾·福柯著，劉北成等譯：《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
- 〔法〕米歇爾·福柯著，謝強等譯：《知識考古學》，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 〔德〕卡爾·曼海姆著，黎鳴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
- 〔德〕卡爾·曼海姆著，李朝暉等譯：《保守主義》，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
- 〔英〕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後果》，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
- 〔俄〕列·托洛茨基著，劉文飛等譯：《文學與革命》，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92年。
- Barney Warf. Santa Arias, ed.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Wiley: Wiley-Blackwell, 1992.
-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2, London: Verso, 1991.
- 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s." Jay Miskowicz tran., *Diacritics*. 16 (1986 spring).